

再思 20 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与改造

邢宇宙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近代中国在迈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众多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基于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和判断,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并付诸实践。乡村建设派试图通过乡村教育、卫生、文化与组织改造等重建社会;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并动员农民进行社会革命。尽管两者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都尝试通过一村一地的实验和典型示范扩展开去,强调农村社会动员和农民组织化的作用,实际上都服膺于 20 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目标。这对于 1949 年后我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当下的乡村在未完结的现代国家建设目标之下,正在政府与社会诸多力量的裹挟中寻求转型。

关键词:乡村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动;乡村改造;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53-07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农耕文明社会,虽然明清之际城市社会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变化不仅发生在内部,更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尤其是自 19 世纪以来,新的国际环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同时也带来了劣势和屈辱^[1]。这种现代化过程,费正清曾用冲击——回应模式予以解释,但他也强调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还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2]203}。在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未能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陷于民族危难,救亡图存与强国富民是当时革命者与知识界的共同期许,如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等人,尽管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走向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是都将目光投向了农民和农村社会,或走上动员农民与改造乡村的革命道路,或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社会研究。

归结起来,在革命与改良的路径之下,不同的知识话语和实践进入乡村,如中共在革命道路探索中积极动员农民,寻求支持以争取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乡村建设运动也风行一时,在若干地方开展了乡村教育和技术推广等实验,寄希望于通过乡村再造来推动整个国家建设。这个过程依然值得我们今天重温,一是这些认识和实践是理解和思考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之一,需要更为准确的定位;二是可为当下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回到乡村的革命与社会运动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等列强要求清朝政府开放通商口岸,因此外部冲击最先发生在沿海沿江地区的城市,而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在所难免。但经历了晚清改良之后,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在城市兴起,最终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完成了一场政权更替的政治革命。虽然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但是 1911 年的革命出奇的温和,同时也极不彻

收稿日期:2016-07-06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SH048)

作者简介:邢宇宙(1984—),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

底^{[2]315},表现之一是革命成功后并未能建立起全国统一而稳固的政权,各方势力围绕国家政权展开了长时间的争夺,此时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整合和动员能力相对弱小。与此同时,不仅各界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引发更多讨论,社会层面的大众动员也得以继续进行,并且迅速从城市扩展到了乡村。

(一)作为革命的农民运动

城市是权力中心所在,革命首先是以城市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动员。19 世纪 20 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完成了改组,并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合作。在国民党主导下,国共两党不仅共同在城市里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也领导了农民运动。国民党内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农民部,并通过筹办刊物、拨付经费等加以保障^[3]。1926 年 5 月至 1927 年 6 月,时任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主办了两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对推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起了积极作用^[4]。总体上,革命仍是发动工人作为主要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为主要斗争形式。

此时中共在农村开展的革命动员工作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但是在整个革命史上却占据着重要地位。毛泽东 1925 年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开篇讲到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辨真正的敌友,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指出,作为半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5]4-6}。接下来他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中看到,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 4 个月中就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实现了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经济军事上打击地主、推翻县政权等 14 件大事^{[5]14-42}。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注意工人运动而忘记农民的两种倾向而写,后者则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5]3-12},这两篇都成为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中共早期在若干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是自身革命道路的一种探索,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埋下了火种。在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共产党在城市中的斗争力量受到极大地打击,被迫撤退到边缘地区,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正是那些“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5]49}”。随后国民党持续的军事压力,

使得中共领导的革命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阶段,对外“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对内是“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做军事运动”^{[5]63-79}。至此,大致形成了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开展军事斗争的革命道路。

作为革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并在动员过程中逐步组织化;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实现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手段,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在此之上囿于当时国共双方的斗争形势,中共基于若干乡村地区的改造与建设,为开展武装斗争进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提供了保障,不可否认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和促进,共同推进革命向前发展。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运动

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思考,不仅有主张革命的行动派,更有许多知识分子的介入,以至于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6]387}。具体而言,各界基于不同的思考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做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等^{[7]456-473},以此来重振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与社会。

如一直在寻找“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梁漱溟,早期曾参加宪政运动,在 1927 年也来到了广州,虽然此时他已经有了开展乡村建设的构想,但是并未着手行动,而在广东农村的长期逗留使他直接看到了共产主义者在动员农民方面取得的成功^{[8]112-113}。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传统伦理在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据支配性作用,用这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6]25-32}。费正清也指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不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还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2]230-231}。

这些社会文化模式不仅构成了束缚,更在外部冲击下带来社会失衡。即这一切在西洋潮流输入的过程中遭到破坏,个人本位、社会本位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不成功,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没有建立其新的秩序,出现了极严重的文化失调^{[6]61-69}。费孝通进一步强调这种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症结,表现为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9],以至于需要重新建立起与技术、文化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

态,而不至于出现社会解组或社会崩溃。

梁漱溟正是注意到由于近些年来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乡村自救,再到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要求,最后是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从这四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推动形成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6]9-24},其思想和实践成为了这场社会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问题化的农村与农民

无论是注意到农民问题及其革命性的革命者,还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团体,两者都看到了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破败和失调,其中在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其表述中,把中国乡村界定为一种有问题的乡村^[10],革命者也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两者都强调将农民组织起来,进一步教育农民与改造乡村。

对于革命者而言,在革命道路探索中需要寻找革命力量来源,遂将目光投向了数量众多的农民,采用阶级划分的方法来分析各阶级的革命性。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和半自耕农的问题,从半自耕农到佃农、完全赤贫的农民,其革命性依次增强。在革命初期,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因为贫农最革命^{[5]21},通过在农村的动员和阶级斗争来重构基层政权,以此来逐步实现革命建政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仍在突出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5]1 477},以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目标。

尽管梁漱溟也采用阶级的概念来分析中西方社会,但与共产党人采用阶级分析分清敌友不同,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特征有着不同看法,即基于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伦理本位与阶级分化社会的不同判断,进而提出摆脱危机的途径也不同。梁漱溟也承认,“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中国的农民运动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区别在于“革命工作中的农民运动,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功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7]250-253}。

艾恺敏锐地指出了梁漱溟的理论类似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当中有着毛泽东主义的方面和倾向;反都市主义、强调农村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别、自给

自足等等,只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梁漱溟强调乡村重建的文化改良运动,这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相去甚远^{[8]139-163},而且他认为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7]415-416}。

总之,各方以对于乡土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将问题化的农村和农民作为动员和改造对象,进行乡村建设抑或是社会革命,最终导向的是改造中国社会与重建新国家的目标。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20 世纪初期中国所看到的特点是国家弱、国家主义话语强,此种话语在现代化计划中并未看到市民社会有何用处^[11],换句话说真正的“社会”是被遮蔽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之间殊途同归。

二、从乡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路径

随着革命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与改造实际上是不同政权和力量主导和推进,基于不同思想在各个地域展开的行动。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运动,以对抗或是合作的形式与国家政权发生关联,同时指向了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一)民国政府主导的乡村自治实验

1932 年 12 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议案,并制定出《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规定各省可以自行选定地区进行实验,并可截留地方收入的 50% 作为实验经费。中央政府的专门法规及地方政府的相关实施条例,为地方自治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和依据^[12]。其中,中央政府以江苏江宁和浙江兰溪为实验县进行乡村自治的实验。

在地方层面,由于各地政府推行的力度和做法差异很大,其中广西和山西依靠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重视,成为村治“模范省”的代表。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本着“保境安民”的基本原则,从 1917 年站稳脚跟就开始编织其警察化、军事化的网络,而“村本政治”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环节^[13]。不仅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县”和“模范县”,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特别强调模范的作用,如 1935 年 12 月 4 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中提到:“各地应酌量创立模范农场,应用适当之方法及机械,以提高产率,增加产量”;“以模范农场之优越生产能

力,鼓励农民,使其自动采用新式耕种技术,或组织合作田庄,以谋农业经济之改善及农业生产之增进……”^[14]。为了推进农业生产和行政改革,通过实验探索、模范示范来进行动员是重要手段之一。

概括而言,由于各省各地推行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不尽相同,国家权力深入乡村和改造乡村也呈现出不同情形,但并未能迅速实现其目标。比如对于华北地区的研究表明,对于国民政府推行的行政改革重组,如果以传统乡村治理与新式村镇建设地方实践作对比,尽管乡村在制度层面发生了变化,以及民众对合法化的理解与表达自身关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到 1930 年代传统意义上乡村精英主宰乡村的权力关系依然存在^[15]。

(二)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实验

各地知识分子团体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在定县和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为重要代表。晏阳初创办平民教育促进会,主要依靠美国募捐来的经费在实验区开展识字运动,梁漱溟从参与河南村治学院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得到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以邹平县为实验区,改组了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划,从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入手,到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搞团体组织^{[6]419-422},两人引领了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路径来看,乡村建设派在发展中大多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这场运动也希望通过一时一地的实验探索,推动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建设。晏阳初在 1937 年指出:乡村建设所表现的形式是各地实际社会中的实验工作,希望从一县、一区甚至一村之中,做出相当具体的事业来,或在实验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来,更进而重新建设社会的机构。既然是实验阶段,也就会有“政府推展的阶段”,只是“今日尚未成立,但这个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只要研究试验方面有了具体的办法,即可以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推展出来。乡建的实验运动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付诸实施,而见更重大的功用”^[16]。

针对有人将农村运动看作是“办模范村”的说法,晏阳初强调了“农村运动的普遍性和远大性”,而且期望“今后全国统一的局面已日见巩固,政治上已渐渐上了轨道,国家的建设正可以在整个具体的计划之下,计日程功地逐步推进。乡村建设的大业希望由政府加以提倡和督促,把它放在整个的建设计划之中,求其贯彻”^{[17]33,76}。梁漱溟也直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以云一种建

国运动^{[6]20},到了抗战时期,他更是特别强调“这里划一区,那里划一县的做法,原不过做一点研究和开风气而已,说不上什么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运动,第一步就在调整社会关系求得国家统一;第二步乃在有目标地推行一大建设计划”^[18]。

尽管这场运动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却并未给整个乡村社会带来大的改变。陈序经直言其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略加检讨,难免失望^{[19]108-109}。从内部来看,梁漱溟自己总结有两大难处,第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6]368}。从外部环境来说,各地乡村建设实验跟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很大关系,这种努力往往因为政局不稳和战争动乱而不得不终止,如梁漱溟在广东是李济深倒了,河南是中原大战爆发,而山东是随着日军的入侵不得不终止,晏阳初坚持了 10 年之久的定县实验,也因抗战爆发被迫转移。而在有些批评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其理论上以农为本的错误,即使没有抗战的因素,能否维持下去也成问题^{[19]120-121},与此相比,以吴景超和陈序经等为代表则提出了“工业立国”,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现代化主张之一,这里不做进一步地讨论。

(三)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乡村建设派在农民动员方面的失败,与共产党在农村的社会动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革命后毛泽东及共产党人辗转到了陕北,继续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以变革农村土地所有制等生产关系的方式,动员农民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和生产运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延安道路^{[2]203}。而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梁漱溟积极为“动员问题献议当局”,并受邀参与国防参议会。1938 年,梁漱溟正是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带着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真的“放弃对内斗争,是国家较进于统一”的疑惑,最后得出“转变是真的,但认识没有变”,对于统一只是“像有希望而已”的结论^[18]。尽管梁漱溟与毛泽东围绕《乡村建设理论》有若干争论,但是此行梁漱溟的主要意图显然是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更多的是奔走国事。

在随后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因为战局的原因,乡村建设运动大都终止了,小部分退守到少数地区继续维持。而中共以陕甘宁根据地为模式,在各地建立了数个大小不等的根据地政权。由于抗战需要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支撑,必

须最大限度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抗战,比如山西为增强抗战动力,保障抗日军民军需供应,积极发展生产,组建代耕队、垦荒互助组、生产互助组、纺织合作社等劳动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使整个山西抗日根据地变成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21]。在这之中,晋、冀、豫根据地太行区的辽县也进行过名为实验县的改革,在此主持工作的李雪峰在太行根据地举办的第一届文教群英会上讲到:我们建设一个根据地,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也要有一支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还需要有一支文化大军^{[22]106,280},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与文化宣传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依靠党在抗战中对于社会的全面动员,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

(四)革命与社会运动的道路之争

革命和社会运动的进展,不仅受制于理论上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判断,更受到现实中各方力量实力对比和斗争形势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两条道路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遭遇,如前述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延安谈话中,两人已经有了“革命还是改良主义”的争论^[23]。

事实上自抗战结束之后,国内未能实现和平统一,乡村建设派已经没有更好的实验机会。在1948年晏阳初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是学术社会团体,所能为力的乃是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至于较大规模的推广实施,非赖政治力量不可。而不幸这30年来,国家连年内遭遇内忧外患,政治始终未能踏入正轨”^{[17]93}。而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改造和社会动员也推展开去,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和支援解放战争,为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尽管此时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也推行的极为谨慎,即使到了1948年5月,毛泽东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仍指出土改要视条件和情况而定,强调“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24]。

在通常的讨论中,突出强调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观点的对立,如基于两者之间文化观的差异,形成了阶级斗争的革命与改良主义的运动两条道路,而共产党抓住了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开展土地革命^[25],在

武装斗争中成功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其实梁漱溟早在1927年的广州已经看到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也就为1938年两人之间的争论暂时划上了句号,梁漱溟也由现实发展而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进一步转变,明确看到共产党这一新政治主体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强有力存在的,表现出来的整合和组织能力^[26],解决了他眼中“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的弱国家问题。尽管如此,但是在具体方略上的争论并未停止,如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关于经济建设的言论就引发了对他的批判^[27]。

不过,在革命动员与乡村建设运动之间,并非两条道路的绝对对立。梁漱溟早年指出旧社会与西方遭遇后的崩溃,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其失败之处表现为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6]49}。在晚年他也提到:“毛泽东的入手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我要建设新中国,入手也是农村,主要往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方面走,一定要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28]。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或许两者都触及到了实现现代化与超越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找到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模式^[29],以至于1949年后国家建设道路一度在曲折中前行。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度延续了以阶级划分为手段开展的“继续革命”,但终究还是沿着“组织起来”“科技下乡”等方向前进,并有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合作化运动,实现从生产组织、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计划与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继续革命和群众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快速工业化的强烈需求,梁漱溟所提到的组织和科技问题,也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建设与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继续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目标交织在一起,两者都强调对于社会大众的动员。而在这类动员体系中,动员社会资源的主要工具是党和行政机器^[30],在中国是从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31],事实上革命动员传统中承续的遗产对于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三、历史遗产及其启示

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与改造,无论是

革命者还是乡村建设派都强调对于乡村的关注,乡土中国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坐标。费孝通指出关于乡土中国的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8]4}。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之所以收效甚微,其内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乡村不动”的动员失败之外,还在对于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认识上的缺陷,比如乡村循环发展过程中的开放和闭合特征,就是乡村建设派所未能注意到的^[32]。事实上乡村重建过程中的制度革命与创新,乡村社会内外关系重建的路径选择,都要实现乡土的创造性转化^[33],过去数十年来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就是在探索这种转化的路径和机制。

如果说 1949 年以来乡村社会变革,还受到“继续革命”的羁绊,尤其是高度统一、城乡分割的计划体制和管理格局,在带来工农现代化成就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社会活力。那么 1978 年开启的农村改革,不仅再次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重构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推进,1990 年以来出现了农民税收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现象,“三农”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国外资本大量进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两亿多流动人口。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崛起的中国制造,一度凭借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侵蚀,村庄内部经济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边界还在进一步消弭,加速了村庄人口、经济、文化等各要素与外部社会之间的流通与互动,使得城乡和区域差异越来越明显,表现为部分农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终结,一部分农村进一步空巢化,呈现出凋敝的状况,而且一些乡村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失调加剧,这一状况未来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宏观上而言,我们仍处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双重目标之下,政府和社会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作用。首先现阶段以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践层面还带有运动式治理的痕迹,主要是基于政府权力的科层式动员,进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特别是 2004 年至 2015 年中央连续 12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聚焦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在国家层面逐步开启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

村,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

在此背景下,各地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国家治理话语导向下,乡村在产业转型、文化复兴、组织再造、社区治理乃至生态环境等不同面向进行探索。各地也通过实验和试点培养、树立和宣传典型,供其他地区农村参观学习。有学者注意到今天以试验为基础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吸收了非共产主义人士开展的社会试验,也是党在革命战争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是重要的革命传统^[34]。尽管对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仍存有争议,但是当前局部地区的改革创新与政策试点,成为启动全国范围内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以至于地方试验已成为理解中国多层次循序渐进改革过程的重要视角^[35]。这种地方经验或政策学习和扩散过程,对于促进地区之间交流互动、缩小差距无疑存在一定的示范作用。

其次市场和社会力量介入乡村建设和改造,表现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和以公益目的的社会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又与政府力量相结合。在部门资本和工商资本大量进入乡村的情况下,已有研究表明,并没有使“三农”发展步入良性运行轨道^[36]。而在一些地方以社会组织推动的乡村建设开展起来,已有一些典型组织和案例,如温铁军及其领导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何慧丽等在河南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廖晓义及其地球村在重庆和山东等地开展的乐和家园建设等,温铁军也直言他们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的关联^[37]。当下社会组织参与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但是民间组织参与的力量仍然相对弱小,尤其是村庄内自组织的发育状况并未有显著改观。

总之,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与改造,到 1949 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近年来的美丽乡村建设,构成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话语和实践。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互动的视角来看,乡村在近百余年来既是各种力量建设和改造的“实验”场,也是不同力量之间斗争和博弈的“运动”场;作为建设和改造对象的“旧乡村”与作为目标的“新农村”,不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也再生产各种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和市场化加速转型的背景下,资本与人口更加频繁流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加速重塑乡村社会的面貌。

与此对应,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公民社会也在经历曲折发展、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38],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深入乡村的过程尚未完结。仅

仅以问题为导向,或是寻求总体性解决方案已不可行,回顾历史为当下带来两点启示:一是不同主体介入过程中,乡村建设首先是社会建设和赋权(social empowerment),真正激发乡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非政府或社会单一主体的社会动员;二是发展路径上需要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思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之间实现协调,即寻求一种以农村和农民为本的内源式、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这些都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0.
-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M]. 张沛,张源,顾思兼,译. 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8.
- [3] 黄志坚. 第一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农民运动[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3):90-97.
- [4] 邵雍. 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J]. 广东社会科学,2004(1):93-99.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7] 郑大华.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8] 艾恺.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 王宗昱,冀建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1.
- [10] 赵旭东.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 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 [11]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4-165.
- [12] 俞可平,徐秀丽.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26.
- [13] 张鸣.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70-71.
-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卷:政治2)[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576.
- [15] 李怀印. 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 岁有生,王士皓,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8:273-274.
- [16] 晏阳初.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M]//宋恩福. 晏阳初全集(第1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561-562.
- [17] 晏阳初. 赛珍珠. 告语人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18] 梁漱溟全集(5)[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86-87.
- [19] 陈序经. 乡村建设运动的未来[M]//余定邦,牛军凯. 陈序经文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 [20] 马克·赛尔登.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 魏晓明,冯崇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2.
- [21] 岳谦厚. 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4.
- [22]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23] 陈晋.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J]. 中共党史研究,1990(6):42-47.
-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8-1 331.
- [25] 郑伟.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思想的分歧及原因[J]. 党史文苑,2014(2):31-33.
- [26] 贺照田. 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J]. 开放时代,2012(12):74-96.
- [27] 梁培恕. 梁漱溟记述的顶撞毛泽东事件[J]. 炎黄春秋,2012(9):53-55.
- [28] 梁漱溟口述,艾恺采访.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实录[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92.
- [29] 郁建兴,朱旭红. 毛泽东与梁漱溟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 杭州大学学报,1994(3):1-9.
- [30] 戴维·E·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M]. 陈尧,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269.
- [31] 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 何俊志,王学东,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89.
- [32] 赵旭东. 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J]. 开放时代,2011(12):99-112.
- [33] 徐勇. 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J]. 天津社会科学,1996(5):61-68.
- [34] 韩博天. 通过实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3):103-128.
- [35] 安·弗洛里妮,赖海榕,陈业灵. 中国试验: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改革[M]. 冯瑾,张志超,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5.
- [36] 赵祥云,赵晓峰.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7-22.
- [37] 温铁军.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J]. 开放时代,2005(6):5-10.
- [38] 王名. 社会组织论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55.